

报展有益于国事：报纸展览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刍议

徐基中

摘要

1935至1936年，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会”、上海“世界报纸展览会”与汉口“全国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会”相继举行。作为政治传播的一种形式，报纸展览会在官方持续介入之下，党化色彩日渐浓厚，成为了施展政治规训与民族主义教化的空间和载体。一方面形塑着民众的革命记忆与政治认同，确认和巩固了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深化了民众的国难意识，提升了民族自信力，并动员他们投身民族国家的拯救与复兴。这对于20世纪30年代遭遇合法性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国民政府及中国国家而言不无裨益，在此维度上可以说“报展有益于国事”。

关键词

报纸展览会、政治传播、政治规训、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徐基中，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djin1900@163.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国家、记者与团体：民国时期新闻记者公会研究（1931—1949）”（项目批准号：17YJC860028）的阶段性成果。

On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Newspaper Exhibitions

XU Jizhong

Abstract

From 1935 to 1936, three newspaper exhibitions were held in Hangzhou, Shanghai and Hankou successively.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se exhibitions have become a field for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nationalist enlightenment, due to the involvement of political power. They have shaped people's revolutionary mem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onfirmed and consolidat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KMT.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deepened people's sense of national crisis, raised their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mobilized them to join the liberation and renaissance of China. Therefore, these newspaper exhibitions were beneficial to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suffered from the crisis of legality and national crisis in the 1930s.

Keywords

newspaper exhibi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discipline, nationalism

Author

Xu Jizho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Email: djin1900@163.com.

This article is a part of project “The State, Journalists and occupational groups: A study of Press associ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1931-1949”, 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17YJC860028).

中国的报纸展览会以1926年上海新闻学会举办的南洋报纸展览会为嚆矢，至1948年共举办了20余次（钟华俎，1948；胡道静，2011：511）。报展会最明显且直接的功能，在于展示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增进民众对新闻事业的认识，并有助于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成长（齐辉，2010）。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何种角度进行新的解读？吴廷俊（2008：11）先生曾揭示中国新闻事业生长的动力机制为“政治推进”。无独有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展览会事业的发展史也是政府行为渗入的过程史（乔兆红，2007；吕绍理，2005：92—93）。这些论断是否适用于报纸展览会？如果适用，官方希望藉此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作为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潮或运动，民族主义与展览会之发生关系，始自晚清，盛于民国（马敏，洪振强，2009）。在国难频仍的20世纪30年代，报纸展览会也应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无疑是个合理的推测。那么，二者是如何勾连的？本文尝试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为此我们选择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影响较大的三次报展会作为研究对象，即1935年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会”、上海“世界报纸展览会”与1936年汉口“全国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会”。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续，主办者亦涵盖了新闻业界、新闻教育界和官方，便于问题的全面阐述及比较。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前的20多次报展会，绝大多数举办于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钟华俎，1948），受限于时局、交通等因素，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均不及本文所研究的三次报展，加之资料稀缺，故不作重点考察。

一、“有形的手”：官方介入从渗透到主导

1935年9月1日至7日，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举办了“全国报纸展览会”，藉以

纪念第二届“九一”记者节。1933年9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保护新闻事业人员令》，次年杭州记者公会即首倡以该日为记者节，“盖体当局扶植之初衷，为本身策励之张本。”（东南日报，1936）但保护令最终流于具文，权力机关或领袖个人对新闻界的摧残并未稍减。1935年国民政府又通过《修正出版法》，进一步压缩新闻自由的空间，“与二十二年今日行政院维护舆论之通令，大相违忤”（东南日报，1935年9月1日a）。兼之第一届记者节反响并不热烈（雨田，1941；申报，1946），杭市记者公会“深感前途荆棘多，对此记者节尤应热烈举行，借示一致团结发扬新闻事业之至意”（何扬鸣，2013：175），遂有此次报展之筹议。

这一年适值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全国开展读书运动，“该会浙江分会负责人许绍棣，要求将该会名义共同列为报展主办者。”（钟韵玉，樊迪民，1983）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蒋介石授意力行社发起组织（魏万磊，2010），蒋自兼名誉理事长，理事长由陈立夫出任，国民党中央宣部部长邵元冲为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名誉理事几乎囊括了国民党高层要员。该会宗旨为依据三民主义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在政府未以统制政策适用于文化事业之前，本会将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渗入本组织，以达建设革命的文化之目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a：766-775）为此要求各地分会设立教育、出版、新闻、戏剧等各项事业委员会，“初步不必各种委员会完全成立，但至少须先组织教育事业委员会及新闻事业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可见，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深具官方背景，是当局施行文化统制、新闻统制的重要工具。许绍棣为浙江分会干事长，曾为《杭州民国日报》社长，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副干事长刘湘女、评议长兼省党部委员胡健中、干事朱苴英等，同时列名杭州记者公会执监委员（浙江青年，1935；东南日报，1935年5月27日）。1935年4月，浙江分会按照总会要求，举行读书运动宣传周，活动之一即为图书展览（浙江图书馆馆刊，1935a），这些都促成了它与杭州记者公会的合作。

文建会浙江分会的参与并非停留于“名义上”，而是深度介入展品之征集等环节，“有关（国民党）革命史实之刊物，搜罗甚富。”（艺风，1935）报展开幕典礼由刘湘女主持，出席者有分会副干事长、省新生活运动会推行股股长项定荣，分会干事、教育厅代表傅荣恩，省党部委员王廷扬、陈贻荪、周望伋，建设厅代表杨家腾等党政机关代表。展览会期间，各党政领袖、名流学者（几乎全为文建会浙江分会成员）亦逐日赴浙江广播电台作播音演讲（杭州青年，1935；浙江青年，1935；何扬鸣，2013：167）。官方色彩的凸显，意味着杭州记者公会作为报展主

办者之一的角色被大大淡化，话语权遭到削弱。

同年10月7日至13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为纪念建校30周年，举办了一场“世界报纸展览会”。分析展品之来源，亦可窥见官方介入的痕迹。复旦报展筹委会曾言：“以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新闻教育机关，利用课余来做这件繁杂而又重大的工作，事前，实在不敢有怎样的把握。所幸的是有外界的赞助。”4月下旬，筹委会派员赴南京，“与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会商，请求协助，宣委会除供给《报社通信社一览》外，并且愿意赠送重要陈列品。后来在会展览之全部华侨报纸，即由该会赠送。”筹委会以中宣会赠予的《报社通信社一览》“作为搜集的根据，将印就的《国内报纸征集调查表》，连同信件，分别发出。”此项调查表和信件，共发出2000余份（报展纪念刊，1936a），而国民党中央宣会主动赠送展品，亦显示了官方积极介入报展会的姿态。

复旦报展的范围从“全国”推向“世界”，而筹委会“最担心”的却是世界报纸的征集：“因为做这种工作，既要大量的金钱，又要相当的参考，像我们既付不起那样多的邮资，预先又没有世界报纸的调查，所以很难着手。”筹委会不得不再次向官方寻求帮助。“后来幸亏找到外交部，承他们允许，替我们做征集的工作。即本会将印就之征集报纸函件表格送交外交部，由外交部转发各驻外使领馆，使领馆再转送驻在国报馆，报馆填就表格，直接寄还本会。这种函件表格，请外交部转发的计有一千二百份。”复旦报展共征集到3000余件展品，除借陈自杭州“全国报纸展览会”的1400多件外，其余主要依靠国民党中央宣会和外交部协助征得（报展纪念刊，1936a）。可见，此次报展能够顺利举行，实赖官方助力良多，遂在无形中具备了官方背景（齐辉，2010）。且因其将近半数展品来自杭州报展，文建会浙江分会也间接对复旦报展产生了影响。

如果说沪杭报展时的官方介入尚属“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汉口报展时，官方已走向前台主导一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鉴于武汉为九省通衢，但文化落后，“甚至有沙漠的称号”，殊与武汉在全国的地位不相匹称，并有碍于国家的复兴，遂在沪杭报展之后，拟议组织“全国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会”（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a）。这不是汉口市党部第一次策划展览会，相反，它有着较为成熟的策展经验。例如，1934年3月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长达20余天，参观者约50万人次。1935年6月举办为期14天的美术展览会，陈列2万余件展品，每日参观者达五、六千人（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311-313）。

1935年10月，汉口报展筹委会在市党部成立，由市党部常务委员江述之任主席委员。从下表可知，汉展筹委会成员多具有国民党背景。

汉口“全国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会”筹备委员一览表

姓名	职务或任职单位	备注
江述之	华中通讯社主编	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常务委员
王亚明	《武汉日报》发行人兼总编辑	王为国民党党员，《武汉日报》为国民党中央宣部直属党报
丁文安	《扫荡报》总编辑	丁为国民党党员，《扫荡报》为国民党军报系统的核心
李尧卿	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主任	国民党党员
林荣葵	汉口市党部宣传科主任	国民党党员
沈丹階	汉口市政府教育股股长	
胡復	汉口市政府	
王研农	汉口市民众教育馆馆长	国民党党员
谢楚珩	《新民报》总编辑	曾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第八区党部第一区分部执行委员
赵惜梦	《大公报》发行人兼撰述	国民党党员
刘静哉	《汉报》发行人兼撰述	国民党党员
徐铸成	《大公报》武汉特派员兼驻汉办事处主任	
高子约	汉口商务印书馆经理	
唐性天	汉口现代书局经理	曾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第八区党部第五区分部执行委员
钟养初	不详	

汉展筹委会成立后，分三步征集展品。首先在本埠及外埠重要报纸登载启事，或发函征集，计向中央及各省市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学校、图书馆等发函5300余封。其次呈请市党部转请国民党中央宣会函令中央及各省市党政军机关尽量应征，“这种办法较前者更为有力”。第三是派员赴沪宁杭等地征集，得教育部、沪杭市党部之援助，“幸获圆满结果”（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a）。在党政军系统的组织动员之下，汉口报展共征集到14500件展品，远远超过沪杭报展的规模。

因应“儿童年”之实施，汉口报展增加了“儿童读物”的展示。1935年4月，行政院决议自当年8月1日起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儿童年，各地须发起大规模的儿童幸福运动，由中央及各级党部指导协助（内政公报，1935a）。根据办法大纲，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首先在南京举办“全国儿童读物展览会”，嗣后进行国内巡展（公教学校，1935）。作为履行党务工作的一部分，汉口市党部积极行动，取得了第一次巡展权。

不唯如此，这次报展的经费共计2190元，几乎全赖官方挹注，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补助500元、驻鄂特派绥靖公署补助300元、国民党中央宣会补助100元、湖北省政府300元、武汉警备司令部300元、汉口市政府及市党部各200元、

鄂湘川边区剿匪总司令部200元（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b）。

1936年2月21日，汉口报展举行开幕典礼。总主席由驻鄂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担任，主席团成员皆为党政军各界领袖，如杨永泰（湖北省政府主席）、陈继承（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王绍祐（省党部委员）、吴国桢（汉口市长）、江述之、胡国亭（市党部委员）、陈年新（汉口教育会）、唐性天等，王亚明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会出席。行礼如仪后，何成濬、江述之及中宣会、市党部、市政府代表等相继致词。展览会期间，担任会场职员者16人，统由市党部及其下属的妇女会、国货运动会、常识指导会、新生活运动会，党媒中央社武汉分社与《武汉日报》《扫荡报》，以及市民众教育馆调派（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c；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280-281）。可见，汉口报展的主导权全面掌握在官方手中，是名副其实的官办展览会。

二、政治规训的空间

（一）展览背后的权力运作

展览并不是中立的行为。吕绍理（2005：34）指出，展览会研究的取径之一深受福柯（M. Foucault）影响，即将展示活动视为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施展，受规训制约者处在可见的位置，而拥有权力者则隐身幕后，窥伺着那些展示的人与物。报展会能够展示给观众的，即可观看的报刊，都经过了官方筛选选择，展示本身充满了权力的许可与运作。杭州报展即是在市党部备案许可后开始筹备的（东南日报，1935年5月27日）。汉口报展在展品征集之初，强调各种刊物“以非中央所查禁者为限”（内政公报，1935a）。待各地刊物运抵汉口，筹委会复组织新闻纸、杂志、公报、儿童读物四个审查会。“所有展品，均先交各组分别审查而后陈列，藉以为有系统之整理，而免反动刊物间杂，以影响观众也。”（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a）国民党中央宣会供给的《报社通讯社一览》，既为复旦报展提供了展品选择的空间，同时也将一些“非法”报刊排除在展览会场之外。因为该一览表必然是经过官方审查后准予登记的“合法”报社通讯社，而未通过审核者则不在此列。这种“选择性展示”使得报展会具有了“展示”与“遮蔽”的双重作用。最明显的是国民党党报在报展会上占有相当比重，如复旦报展中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党报数量均在各该省展品总数的50%以上（报展纪念刊，1936b），这种状况同样见之于汉口报展。这也暗示了国民党欲藉报展会达到发扬党义、扩展国家统治的目的。反之，那些未经主管官署登记注册的报刊，尤其是受到官方查禁的“反动刊物”，则被遮蔽在外，没有展示的机会。

即使少数获准展示的“反动刊物”也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汉口报展对文艺期刊标注的文字说明即为例证，如《文艺月刊》“以提倡民族主义文学为鹄的，态度甚为公正”，相反，《文学新辑》“意识反动，系左翼刊物”，《小文艺》“有挑拨阶级斗争意味”（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d）。这种标签化做法不仅直接表明了官方立场，而且警示参观者应当选择何种“适宜的”刊物来阅读。可见，政治权力参与展品的征集与甄选，既可指引报展会展品选择的倾向性，又能起到把关筛选的作用，确保所有展品符合官方标准。

除此之外，展品的布陈方式、展示位置、观看线路等，也是在权力操控下“一种秩序观的示现。”（吕绍理，2005：41）就中国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历史和重要性来看，上海向来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但复旦报展、汉口报展在展品的陈列次序上，均将南京报刊置于首位，次则上海、平津等地。此种展品在空间出场的先后顺序，宣示了南京作为国家首善之区的政治优越地位。这种位阶差异，正指向了本尼迪克特（B. Benedict）所说的“物品陈列的目的之一为凸显既有社会的等级与威望”（吕绍理，2005：42），从而强化着人们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认同。

（二）革命记忆与政治认同之塑造

合法性是政治运作的基础，任何统治者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辛亥革命在国民党的党史叙述中，地位最为突出，它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根源。国民党一向重视利用展览这一空间形式对民众进行辛亥革命记忆的塑造：“欲求党史精神之普遍，使一般民众，对于本党信仰之坚定，以激励其维护民国与复兴民族之决心，允宜将本党光荣历史材料，为公开展览，而作有力之暗示。”（张继，1937）除建造党史陈列馆、烈士纪念祠堂外，国民党还善于借助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如1929年以国货展览为主的西湖博览会，专设“革命纪念馆”，位居所有馆所之首，“所以昭示民众，唤起同情，以完成国民革命”（杨石湖，1929）。职是之故，报纸展览会被纳入国民党党史叙事和革命记忆形塑的轨道，并不令人意外。

杭州报展对有关国民党革命史实之刊物“搜罗甚丰”（这些展品后来又移往复旦报展），汉口报展亦强调“已经停刊而有革命历史价值者均在征集之列”（内政公报，1935b），并展示了大量由各地国民党党部提供的“特种杂志”，如《革命先烈纪念专刊》《革命政府纪念特刊》《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专刊》等（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d），这些都是国民党党史记忆的载体。可见，报纸展览会通过对历史资源的征用，对革命刊物的展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形塑着人们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背后是关于国民党

合法性来源的叙述”（陈蕴茜，2011），从而将辛亥革命的记忆与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合二为一，达到教化民众、传播官方历史话语的目的，感召民众追随国民党一道奋斗。

（三）政治信任与领袖崇拜之培育

仪式是政治信仰的重要铸造者（科泽，2014：110）。杭州报展和汉口报展的开幕典礼即是典型的政治仪式，包括全体肃立、奏乐、唱党歌、向党旗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等程序（东南日报，1935年9月1日b；新民报，1936），与国民党推行的总理纪念周程式几乎一致（国民政府公报，1927），党化色彩鲜明。依据国民政府的规定，所有集会均须举行此种仪式（陈蕴茜，2006），复旦报展当亦概莫能外。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像、总理遗嘱这些象征符号，不仅建构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仪式空间，传递了国民党的政治神话，影响着民众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而且营造出一种“笃信的氛围”，“令人对参与者和政治制度本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信任。”（科泽，2014：104）换言之，报纸展览会藉仪式操演传达了官方意识形态，有利于凝聚政治向心力，培育民众对现政权或政治制度的信仰和忠诚。

具有杰出魅力人格的领袖人物，同样能够聚合起民众的政治信仰和忠诚。作为国民革命的精神导师与最高领袖，孙中山正是这样一个魅力型领袖。在他逝世后，国民党大力推行孙中山崇拜，藉以整合民众信仰，巩固政治权威（李恭忠，2004）。总理遗像与总理遗嘱是国民党塑造孙中山崇拜的重要符号，也是三民主义的象征与载体，被赋予了隆尊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形成超越一切的符号霸权，充斥于日常生活空间及各种仪式、集会、书籍、报刊中。报展会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与各级政府机关诸种公报，是总理遗像和总理遗嘱的当然载体，即便《申报》《新闻报》等民营报纸，在它们遵照官方要求发行的《市政周刊》、《首都市政周刊》，以及书籍首页上，亦须刊印总理遗像遗嘱（陈蕴茜，2006）。这样从报展会的开幕仪式，到展出的党报、官报、民报、图书、杂志，甚至华侨报纸，“在他们的报帽下，同样的常有着总理的遗嘱”（大光报，1936年2月22日）。因此称报纸展览会为孙中山崇拜的集体展示，并不为过。

此外，在汉口报展新闻纸第一展览室，“房内的两边墙上，对悬着总理和蒋委员长的照相”（大光报，1936年2月22日）。这是由汉口市党部提供的“特种展品”（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d）。蒋介石像与孙中山像“对悬”，既暗示了蒋是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唯一继承者，为蒋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合法性，也表明一个新的崇拜对象正在形成。

（四）国历运动之倡导

时间是政治规训的符号。沪杭报展陈列了数十种元旦和双十节特刊（浙江图书馆馆刊，1935b；报展纪念刊，1936b）。1月1日不仅为新年伊始，更是“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两个国定纪念日，均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中央党务月刊，1930）。这些纪念日不但具有保持社会记忆、增强个体归属的功能，它们所依附的阳历历法也是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之一。

历代建政，易朔为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颁令改历，嗣后北洋政府采用阳历而不废弃阴历，导致后者在整个社会上占据主流，阳历仅为点缀。作为“革命的新设计”（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8：7），阳历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国历”，1928年以后官方采取政治强力发起了一场废除旧历（阴历）、普用国历运动。使用阳历成为遵奉孙中山遗训的象征，沿用旧历则被批判为“奉行满清的正朔”“民国的叛徒”，北洋政府阴阳历并用也被视为“军阀假共和名行专制实的一种象征”（中央周报，1928）。可见，国民政府发起的这场改历运动既含有“改正朔”、宣示政权合法性的寓意，也兼具通过统一历法来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设立国历纪念日，是推行阳历的方式之一，报纸则为“彻底革除阴历之表率”（左玉河，2005）。如此报展会上数量众多的元旦、双十节特刊，连同以阳历标注出版日期的中文报刊一起集中展示，客观上具有倡导民众普用“国历”及确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作用。

（五）国策政令之宣达

展览会既具有高度政治纪念和仪式化的目的，也具有宣传实质政策的功能（吕绍理，2005：398）。杭州报展、汉口报展期间均邀请党政领袖或报展筹备委员赴广播电台做播音演讲。例如，赵惜梦（1936）在《报纸与国防》中称：“国难严重的时候，首先要注重统一人民的意志，有了统一的意志，而后才有共同的信仰，有了共同的信仰，而后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民众的意志真正统一了，对内自然能精诚团结，对外自然能一致御侮。”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所一再申述的，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救亡御侮之道，“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4b：582-584）这表明国家政策藉报展会得到了再次确认和宣扬，并随着演讲内容刊诸报端，又形成了官方话语传播的持续性和重复性，藉以说服民众在政府领导下齐趋于救亡之路。

公报为国家施政之报告。汉口报展特别设置了“公报”一项，分政治、经济、

教育、司法等6类，计1500册。市党部意在“沟通民众与政府间的隔膜”：“中国民众向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众对于政府非常隔膜，一切行政设施，一概不问不闻”，通过报展会“鼓励民众阅读公报，使能明瞭政府工作情况，知道政府做的事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连的”（武汉日报，1936年2月22日a），“然后发号施令，始能深入人心，而无扞格也。”（武汉日报，1936年2月22日b）由此官方藉报展会开辟了官民沟通的渠道，希望达到上下相通、政令畅达之效。

三、民族主义教化的载体

（一）灌输国难教育

报纸负有“向导国民”之责，1935年又值日本运动华北自治、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之际，报纸展览会对救亡图存之宣传亦不落人后。复旦报展即“反映了爱国的知识分子的一颗赤心”（蒋金戈，1988），特辟“沪战号外”一组，陈列一二八事变期间沪杭各报发行的号外，共43种（报展纪念刊，1936b）。这些号外的标题，“最足动人遐思”：

从《日本不宣而战》《闸北庙行激战》《日军三易主将》《吾军奋勇杀敌》以至《退守第二防线》《李顿调查团来华》等等，那一连串的事实，仿佛就在目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三年的光阴，演成时局不少的变幻，人们的脑海，早已留不到多少印象，惟有那报纸，将永久的深刻地留着吾们惨痛的一页（凌遇选，1936）。

它们被搜集在一起展示，可以说是“上海各抗日报刊的一次检阅”（蒋金戈，1988），“确为一大时代中新闻事业的（爱国）精神的表现”（上海通社，1984：431）。有关一二八事变的新闻照片也得以展示，“它的含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蒋金戈，1988）。这些号外、照片连同其他20余种国难、救国特刊，如《新闻报九一八特刊》《大晚报国难特刊》《之江日报抗日救国汇刊》等，唤起着观众的九一八、一二八记忆，警示人们勿忘国难，奋起救亡。

这与汉口报展的主旨是接近的。何成濬在汉展开幕致词中表示：“今日国势阽危至此，……吾人必须运用种种有效方法，从政治与教育着手，合群策群力不断努力，当能挽回劫运。此次展览会举行，即是一种辅助教育。”（武汉日报，1936年2月22日b）这就明确将汉展的主旨与国难教育联系在一起，并在展览会场有着具体显现。“当一走进会场门首，先就看见几个大字横匾，上面书着，‘要知国难

就要读报’”（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e），“登二楼，……楼梯尽端，上悬匾一方，上书：“要看报纸才知国难”，……再登三楼，……复悬有‘完成文化复兴的使命’（等匾额）”（大光报，1936年2月21日），在会场出口的楼梯边，亦贴有“读报纸，才知国难，才能救国”的标语（大光报，1936年2月22日）。如此众多的标语、匾额，旨在教育民众“读报救国”。

会场之外，汉口市党部和报展筹委会还拟定标语20种，分送全市报纸登载，并印刷四色标语7种计1400余份，张贴于城市街头，另外特制白布通告6大张，悬挂于汉口、武昌的通衢要道（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a；大光报，1936年2月15日），由此整个城市也变成了民族主义展示的空间。筹委会复商请市民众教育馆举行宣传周，“灌输民众新闻常识及此次举行新闻纸杂志展览会之重要意义。”（武汉日报，1936年2月12日）各筹备委员亦轮流赴市广播电台讲演，主题涉及报纸对于国难救济之意义。

可见，汉口报展借助展览会场、城市空间与大众媒介，构铸了民族主义展示的综合体，形成了民族主义遍在、共鸣和累积的效应，强化着民众的国难记忆。难怪《大光报》（1936年2月21日）宣称汉口报展的时代意义：“就是由这次‘展览会’的有力宣传所影响的结果，足以促起国家人民普遍的关心时局底良好动机，而成复兴民族的心理建设！”

（二）普及国货意识

国货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符号。它以发扬民族主义为目标，以经济救国为理念，促进了中国国货的生产、改良。在政府、商界、民间的一致合作参与下，国货运动自清末开始绵延近四十年，席卷全国，声势浩大。南京国民政府更将国货运动和国货展览会纳入施政计划，后者也成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主流形式（乔兆红，2007；马敏，洪振强，2009）。

国货运动的影响无远弗届，以致报纸展览会也成了它的言说平台。复旦报展筹委会邀请了英、美、德等国12家厂商，参加电讯印刷器材的展示，独独排除了日本（舒宗侨，1980），其民族主义立场不言可喻。上海明精机器厂是中国唯一的参展商，展品仅2种，在30多种器材中“灿烂着星星的国货之光”（康健斋夫，1935）。中外展品数量之悬殊，“不禁令人气短”。外货重重包围，国货如何发展？有参观者提出：“但望国内报馆能够尽先采用（上海明精厂产品），或予以鼓励，帮助，使能精益求精，或再有所发明，则厂家报馆，两获其利”（凌遇选，1936）。这种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的主张，使人们相信“民族主义消费是抵抗帝国主义的象征”（葛凯，2007：273），契合了彼时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潮，并与展览

会场的各种国货周刊、月刊、特刊，以及广泛刊登于报刊之上的国货运动报道与各种国货广告，共同深化着民众的国货意识，使得报展会具有了提倡振兴国货的民族主义内涵。

（三）建构国族共同体

这三次报展均将彼时已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地区的刊物纳入征集、展示的范围。杭州报展展出了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报纸，会场所张挂之号外，“皆东北沦陷时之号呼也！今日睹此，倍觉怆然！惟其中马占山奋其雄威血战之神情，仍能活跃纸上，此亦大足予观众以鼓舞！”（东南日报，1935年9月4日）复旦报展也陈列了辽宁、察哈尔等地的报纸。这些报刊在汉口继续展出，从而藉由展品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实现了民族主义的复制与传播。如《大公报》（1936年2月23日）一则报道称：

（汉口报展）新闻纸展览中，陈列有国际协报一册，国际协报在哈尔滨，为东北首屈一指之报纸，是册正为九一八事变时剪存之副刊，其中文学，颇多详录当时事迹，并可觇事变中之东北民众意志之一斑，收藏者经几许危险始行携出，故极其珍贵，一般览者，均倍极留连抚玩不忍舍去，殊令人起恢复失地之思。

这一意义也被《汉报》所发掘和传布（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e）。安德森（B. Anderson）认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主要是通过阅读来想象的，报纸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因此，报展会征集展出东北地区的报刊，在国土沦丧的情形下，既可“实现中国象征性统一的目标”（葛凯，2007：260），也为民众提供了想象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空间，唤醒他们的国族意识并投身民族救亡。

（四）宣扬民族复兴

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是国民党号召、动员和组织民众最主要的工具，任何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中，皆可见其制造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装饰”及其所产生的实际成效和重大影响（暨爱民，2013：217-218）。民族复兴作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郑大华，2010），正是由国民党主导推动的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黄兴涛，王峰，2006）。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即是这一民族复兴运动的产物（魏万磊，2010），它倡导民族本位的文化建设，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或重建，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力和凝聚力，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拯救与振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94a: 766-767; 史春风, 2012)。1935年4月至次年末, 文建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读书运动。陈立夫(1935)将其逻辑脉络总结为“读书运动→文化复兴→民族复兴”: “充实自己的学力, 即所以充实民族的力量, 建设自身的智能, 即所以建设民族的文化, 文化复兴运动完成之时, 也就是民族复兴运动础石奠定之日。”王新命(1935)更直言: 读书运动的本质, “和救国运动的本质完全一致。”

文建会浙江分会以“发扬民族文化起见”, 征选了大量由各地文化建设协会保存的中华文化典籍陈列于杭州报展(杭州青年, 1935), 使其成为读书运动的延伸, 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肯定: “此举于中国文化之建设……大有助力。”(东南日报, 1935年9月7日)可见, 文建会浙江分会将杭州报展与读书运动相勾连, 从而将其纳入后者的意义空间, 赋予了它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蕴意。这一意义在汉口报展得到了延续(大光报, 1936年2月21日)。

(五) 提振民族自信力

在时人和当代学者看来, 实现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是恢复民族自信力, 民族自信力则植根于民族的固有文化和灿烂历史之中(谢耀霆, 1933; 训慈, 1935; 郑大华, 2016)。杭州报展和汉口报展对中华文化典籍的热忱展示, 即是对民族文化的张扬, 后者亦通过展出《强盛时代的中国》等刊物, 追溯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证明“中国并不是弱国”(新闻纸展览特刊, 1936e)。且昔日辉煌的历史与任人宰割的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 更容易激发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民族自信力不能仅仅建立在对过去的称颂缅怀上, 现实的民族复兴有无可能? 报纸展览会提供了答案。

报展会展示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经由各种图表、照片及报刊形态、销量、印刷设备的今昔比较等, 直观展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 也从侧面证明了国家在前进: “翻阅过去几十年的报纸, 再看看几十年后的今日中国, 事实上是在‘突飞猛晋’, 一切都在‘突飞猛晋’。”(新闻纸展览特刊, 1936e)汉口报展中的公报, 更充斥着“公路完成, 长途电话竣工, 航轮往来, 交通便利”等各种名目, 亦给予观众一种“中国的建设事业, 是非常进步, 日新月异”的认识(新闻纸展览特刊, 1936e)。复旦新闻系教授、《新闻报》印刷部主任章先梅, 赞扬上海明精厂产品品质“超越了一切外货”, “成本却只外货的一半”, 使人们“益加深信, 中国人不是没有救药的, 中国货不是一定不如人家的。”(先梅, 1936; 凌遇选, 1936)这样报展会既展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也振奋

了民族精神，充实了民族自信力，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可见的希望。

四、结语

近代中国的展览会事业是在官方支持、倡导下兴起的（乔兆红，2008）。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力量对社会的强势渗透密不可分。1928年底，国民政府颁布了《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进一步将展览会纳入政治运作的体系，党化色彩日趋浓重（马敏，洪振强，2009；廖文硕，2011）。1931年8月，中国报学社在杭州西湖筹办了一次全国报纸展览会，这是南京政权建立后的第一次报展会。作为一种新型的展览形式，西湖报展会立刻引起了官方注意。不仅浙江省党政机关派员莅会参观（樊迪民，1933），而且国民政府实业部当即决定在同年双十节举办全国报纸展览会，除将在杭州陈列者移往南京外，“并请中央党部，将历年搜集之党报，暂借陈列，藉以发扬党义”（益世报，1931；申报，1931），后因九一八事变而搁浅。此后国民党主导发起民族复兴运动，文化复兴成为民族复兴的关键环节。作为文化事业的报纸展览会，无疑受到官方特别重视。由此从杭州报展、复旦报展，到汉口报展，官方的介入持续且深入。

这种介入更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与信任危机而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北伐结束后，由于严重的腐化、蜕变与派系纷争，国民党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权威一落千丈（郭廷以，1980：660；王奇生，2010：312-321）。人们毫不隐讳地表达对它的厌弃之情：“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杨公达，1932）面对日本侵略引发的民族危机以及不抵抗政策，尤使国民党成为众矢之的，时人曾言：“非难国民党，即是最为时髦的举动。”（刘桂，1932）内忧外患之下，“党之名誉与党之威信被地方父老一般民众唾弃得不成样子”（王奇生，2010：321）。这种局面对国民党执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构成了严峻挑战。如何重塑自身权威，凝聚政治认同，巩固政权合法性，说服民众在其领导下齐趋于民族复兴之路，就成为内外交迫中的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报纸展览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在官方介入之下，报展会成为了形塑革命记忆与政治认同、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场域，确认和巩固了国民党的合法性，也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展示的空间，发挥着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力，动员民众参与救亡御侮与民族复兴的功能。这就使得报纸展览会完成了从文化形态向政治传播的转变，其深层意义在于使民众经由观览的过程，达成政治规训与民族主义教化的目的，实现国民党政权稳定以及民族

国家的拯救与复兴。这对于20世纪30年代遭遇合法性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国民政府及中国国家是大有裨益的。正是从这个维度上，我们认为“报展有益于国事”。

报纸展览会的这种政治传播功能在全面抗战期间得到了延续和发扬。1939年重庆“青记”总会于一二八事变纪念日主办“全国报纸期刊展览会”，宗旨之一即为“发扬抗战文化”（韬奋，1939）。1944年贵阳《中央日报》筹办“全国报纸杂志图表照片展览会”，目的也是鼓舞人们同仇敌忾，“加强其反侵略的认识与勇气，以争取最后胜利，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梁寒操，1944）。迁渝办学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和“青记”长沙分会则分别选择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举办报展，用意亦不言而喻（读书通讯，1940；张弓，1940）。

前文已述，报纸展览会既被纳入官方的运作体系，其意义也就被限定在官方框架之内。杭州记者公会选择在当时尚未被官方认可的记者节举办报展会，乃“借示一致团结”，敦促当局切实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新闻杂志，1936）但随着文建会浙江分会的加入，记者节与杭州报展的关联被读书运动削弱了。不止是对意义的争夺，官方也严格限制民间举办报展会，以防止它们逸出权力控制的范围。1934年3月初，南京新新通讯社主任仇培之等开始筹备全国报纸展览会，因展品征集迟缓，遂函请各省市政府及党部转函各地报社通讯社选送展品。国民党中央宣会电令各省民政厅、市社会局，略谓：“查全国报纸展览会，系私人假借名称，单独发起，中央及新闻界均未参加，对该会一切行动，概未预闻，将来如由中央发起此项展览会，当另函知照……”（申报，1934）官方一纸电令，此次报展会遂无果而终，既表明权力的蛮横，也暗示国民党对报纸展览会的政治传播功能有着清晰的认知。至于抗战后的两极对决中，国民党设想利用报展会“揭发中共在其侵占区内的罪恶，并宣布其阴谋”（尼烽，1946），则是对报纸展览会政治传播功能的极端发挥了。

（责任编辑：徐诚）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报展纪念刊（1936a）。我们的工作。《报展纪念刊》，10-11, 11-13。
- 报展纪念刊（1936b）。附表。《报展纪念刊》，155-177, 183-184, 178-179。
- 陈立夫（1935）。民族复兴与读书运动。《中央周报》，（360），6。
- 陈蕴茜（2011）。地方展览与辛亥革命记忆塑造（1927-1949）。《江海学刊》，（4），163。
- 陈蕴茜（2006）。“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江苏社会科学》，（6），106, 111。
- 大光报（1936年2月22日）。参观了新闻展览会。《大光报》。
- 大光报（1936年2月21日）。汉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展览会开幕题词。《大光报》。

- 大光报（1936年2月15日）。新闻纸展览届期摄制影片制就通告悬挂。《大光报》。
- 大光报（1936年2月23日）。新展会第二日盛况。《大光报》。
- 东南日报（1936）。今后之报人。《新闻杂志》，1（12），15。
- 东南日报（1935年9月1日a）。记者节庆祝声中杭阅报运动周开幕。《东南日报》。
- 东南日报（1935年5月27日）。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昨开第七届会员大会。《东南日报》。
- 东南日报（1935年9月1日b）。杭新闻界今日热烈庆祝记者节。《东南日报》。
- 东南日报（1935年9月4日）。全国报展会撷粹（续昨）。《东南日报》。
- 东南日报（1935年9月7日）。杭全国报展会今日为最后一日。《东南日报》。
- 读书通讯（1940）。复旦大学筹备二次世界报纸展览。《读书通讯》，（2），28-29。
- 樊迪民（1933）。纪中国第一次报纸展览会。《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1-2），341。
- 葛凯（2007）。《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公教学校（1935）。订定全国儿童年读物展览办法。《公教学校》，1（24），38。
- 国民政府公报（1927）。纪念周条例。《国民政府公报》，（4），1-2。
- 郭廷以（1980）。《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杭州青年（1935）。记者节之杭阅报运动周。《杭州青年》，1（12），4。
- 何扬鸣（2013）。《民国杭州新闻史稿》。杭州：杭州出版社。
- 胡道静（2011）。《胡道静文集：上海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黄兴涛，王峰（2006）。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3），130-131。
- 暨爱民（2013）。《民族国家的建构：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 蒋金戈（1988）。五十年前的一次世界报展。《新闻记者》，（3），40-41。
- 康健斋夫（1935年10月12日）。世界报展会一瞥。《申报》。
- 科泽（2014）。《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李恭忠（2004）。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纪》，（86）。
- 梁寒操（1944）。文化工作者的当前责任。《全国报纸杂志图表照片展览纪念刊》，3。
- 廖文硕（2011）。寓教于览——战后台湾展览活动与“台湾省博览会”（1945-1948）。《台大文史哲学报》，（74），195。
- 凌遇选（1936）。参观世界报纸展览会的印象。《全球通讯社福州分社两年纪念特刊》，95-96。
- 刘桂（1932）。革命衰败中的国民党。《国家与社会》，（2），9。
- 吕绍理（2005）。《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

- 马敏，洪振强（2009）。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研究（1910-1930）。《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76，73。
- 内政公报（1935a）。教养全国儿童事项。《内政公报》，8（15），83-84。
- 内政公报（1935b）。汉口市全国新闻纸杂志展览会征集展品办法。《内政公报》，8（21），176-177。
- 尼烽（1946）。江苏报展的检讨与批判。《正义》，（4-5），13。
- 齐辉（2010）。民国报业展览会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成长——以上海世界报纸展览会为中心讨论。《国际新闻界》，（10），123-127。
- 乔兆红（2007）。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流变。《学术月刊》，（7），155，151。
- 乔兆红（2008）。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政府行为。《社会科学》，（2），154-162+192。
- 上海通社（编）（1984）。《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申报（1946年9月1日）。记者节的诞生。《申报》。
- 申报（1931年8月25日）。报纸展览将在京举行。《申报》。
- 申报（1934年10月28日）。中宣部声明未参加全国报纸展览会。《申报》。
- 史春风（2012）。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文化运动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94-98。
- 舒宗侨（1980）。复旦世界报纸展览会。《世界新闻事业》，（2），16-17。
- 韬奋（1939年1月29日）。怎样来看报纸展览。《新华日报》。
- 王奇生（2010）。《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生态》。北京：华文出版社。
- 王新命（1935）。读书运动的本质。《现代出版界》，（1），2。
- 魏万磊（2010）。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复旦学报》，（2），136。
-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武汉市志·政党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武汉日报（1936年2月22日a）。汉市全国新展会昨举行开幕典礼。《武汉日报》。
- 武汉日报（1936年2月22日b）。报纸杂志及儿童读物展览会之展望。《武汉日报》。
- 武汉日报（1936年2月12日）。汉市新闻纸展委托民教馆宣传。《武汉日报》。
- 吴廷俊（2008）。《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先梅（1936）。国货“自动机器铸字炉”创制之过程。《报展纪念刊》，150。
- 谢耀霆（1933）。复兴民族须先恢复自信力。《复兴月刊》，1（8），180-184。
- 新民报（1936年2月21日）。新闻纸展览今晨开幕。《新民报》。
- 新闻杂志（1936）。九一记者节舆论专辑。《新闻杂志》，1（12），19。
- 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a）。汉新展会举办经过。《新闻纸展览特刊》，1，3-4。
- 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b）。收支报告。《新闻纸展览特刊》，1。
- 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c）。会议记录。《新闻纸展览特刊》，7。
- 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d）。附录。《新闻纸展览特刊》，101-102，43-44，31。

- 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e）。纪事。《新闻纸展览特刊》，8-9，4。
- 训慈（1935）。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浙江青年》，1（8），1-3。
- 杨公达（1932）。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时代公论》，（4），7。
- 杨石湖（1929）。西湖博览会之概况及其使命。《东方杂志》，26（10），80。
- 艺风（1935）。全国报纸展览会。《艺风》，3（9），120。
- 益世报（1931年8月25日）。报纸展览会。《益世报》。
- 雨田（1941）。记者节日的追忆。《新闻战线》，1（5-6），11。
- 张弓（1940）。记长沙报纸杂志展览会。《战时记者》，3（2-4），54。
- 张继（1937）。党史史料陈列馆与社会教育。《中央党务月刊》，（106），411。
- 赵惜梦（1936年2月22日）。报纸与国防。《武汉日报》。
- 浙江青年（1935）。文化建设协会浙分会成立。《浙江青年》，1（6），4。
- 浙江图书馆馆刊（1935a）。本省读书运动周定四月廿二开幕。《浙江图书馆馆刊》，4（2），3-4。
- 浙江图书馆馆刊（1935b）。杭市记者会筹办全国报展。《浙江图书馆馆刊》，4（4），11。
- 郑大华（2010）。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9-29。
- 郑大华（2016）。民族自信力与民族复兴——近代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之二。《学术研究》，（1），119。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94a）。《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94b）。《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1928）。《国历》。长沙：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
-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初步工作纲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0（3），15。
- 钟华俎（1948）。记社教学院全国报纸展览会。《报学杂志》，1（8），24。
- 中央党务月刊（1930）。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中央党务月刊》，（24），48。
- 中央周报（1928）。实行国历宣传大纲。《中央周报》，（30），42。
- 中央周报（1934）。积极筹备兴筑之中央党史陈列馆。《中央周报》1，（298），18。
- 钟韵玉，樊迪民（1983）。记者节和全国报展。《新闻研究资料》，（20），186。
- 左玉河（2005）。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1辑）（第151-156，169-1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